

叶桂桐 宋培宪 编著

《金瓶梅》

人物正传



南海出版公司

《金瓶梅》人物正传

叶桂桐 宋培宪 编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1991年·海口

琼新登字01号

《金瓶梅》人物正传

编 著 者 叶桂桐 宋培宪

责任编辑 宋亦工 张兴国

装帧设计 王东男

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 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河北省涿州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.875印张 275千字

1991年12月第1版

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950

ISBN7—80570—512-7/I·165

定价：7.00元

序

我们这里恭恭敬敬地奉献给读者的是《〈金瓶梅〉人物正传》。

《金瓶梅》中出场的人物，据专家们不完全统计，有八百多个。一般读者都以为这是一本虚构的小说，哪里会想到这八百多个人物中居然有一百多个宋（包括金）明两朝的真实的历史人物。本书收录了其中将近七十位于史（包括正史、野史笔记）有传的人物传记。

研究文化史的专家们说：在中国文化中，史学文化出现得相当早，而且源远流长。因此，中国人爱谈历史。中国的长篇小说，就是在讲史中成熟的。于是我们较早便有了一部伟大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就是讲史的。稍后，又有了一部更为伟大的《水浒传》。有人把《水浒传》说成是英雄传奇，其实也是讲史的，是元明人讲宋代的历史。想讲史，你就讲吧，不知为什么《水浒传》的写定者们却偏偏要在成堆成岭的宋人中，插上一个明代人物，这就是审理过武松冤案的“阳谷县知县”陈文昭。

《金瓶梅》作者把《水浒传》中有关武松、潘金莲的故事的几回书抽出来，作为框架，写了一部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。《水浒传》讲的是宋朝人的事，《金瓶梅》既然是以《水浒传》中的故事为框架，当然也是写宋朝的事儿了。作者却嫌《水浒传》只插进一个明朝的人物不过瘾，居然在宋朝人物中穿插进二

十多个明朝的人物，而且有的人物当《金瓶梅》以抄本形式在社会上流传的时候，还健在呢（比如赵纳和凌云翼）！这就难免人们要说《金瓶梅》明着写宋朝，暗中写明朝了。

中国人还有个习惯，说不上这习惯是好是坏，就是听戏、看小说总爱探究其中写到的人和事是真是假，爱考证戏曲、小说中的人物的本事，喜欢查户口翻老帐，恨不能查出这人物的祖宗八代。对于《金瓶梅》中写到的这上百个真实的历史人物，自然也不例外。为了满足人们的这种爱好与习惯，用新名词说这叫什么“民族心理意识”，我们对这上百个历史人物的全部档案，但凡能找到的，翻了个遍，什么“二十五史”、“纪事本末”、文人的野史笔记、地方志，总算给其中的近七十位人物写出了本传。我们的气力没有白下，因为这些人物正传一般都比史书上写得详细，而且纠正了不少史书（包括廿五史）中的讹误，可以说比史书上写的更真实。有些人物，虽然不能说写到了他的祖宗八代，但上上下下三代却是都提到了。我们还在每个人物传记的后边写了详略不等的按语，把这些人物与《金瓶梅》中对他们的描写勾连了起来。人们可以很方便地看出《金瓶梅》中对这些人物的描写是真还是假了，心理上总可以得到某种满足。

这本《〈金瓶梅〉人物正传》不光可以让读者了解这些《金瓶梅》中的历史人物的真面目，而且还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理解《金瓶梅》中的其他人物、《金瓶梅》的主题、它的创作过程和作者的情况，无论对阅读理解《金瓶梅》，还是研究《金瓶梅》，都会有所帮助。

《金瓶梅》中所写到的这些历史人物，并不是书中的主要人物，但却又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。没有这

些历史人物，《金瓶梅》也就不是《金瓶梅》，至少不是现在的《金瓶梅》。《金瓶梅》中写到的这些历史人物，他们的价值首先在于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以及由他们所参与的事件，构成了《金瓶梅》一书的系统而广阔的社会背景。《金瓶梅》中的主要人物，像西门庆、潘金莲等等，正是在由这些历史人物及事件所构成的时空中活动的。

《金瓶梅》中所写到的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，上自皇帝老儿，王公大臣，近侍太监，下至知县役吏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官僚统治网，作者对在这个官僚统治网中形成的吏治腐败、贿赂公行、贪赃枉法、祸国殃民的罪行的描写是细致而生动的，对社会黑暗的揭露是极其深刻的，正是这种描写与揭露极大地丰富并深化了《金瓶梅》的主题。已经去世的我国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说：“其实《金瓶梅》岂仅仅为一部‘秽书’！如果除尽了一切的秽褻的章节，它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，其伟大似更过于《水浒传》，《西游》《三国》更不足和它相提并论。在《金瓶梅》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。这社会到了现在，似还不曾成为过去。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，《金瓶梅》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。……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，舍《金瓶梅》恐怕找不到一部更重要的小说了。”（《谈〈金瓶梅词话〉》）

为了通过真实的历史人物，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，《金瓶梅》作者对这些历史人物，本来很坏的，就如实地描写；本来较为清廉的，也进行改造、变形，写得不那么清廉。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陈文昭和杨时。陈文昭本是个清廉正直，弹劾不避权贵，敢于与大奸臣严嵩抗衡，想要愤怒

地打严嵩的耳刮子的人物。《水浒传》中写他可怜同情武松是个仗义的汉子，知道武松冤枉，于是就把武松的罪状档案改得轻了，还特地“使个心腹人，赍了一封紧要密书，星夜投京师来替他干办”，这与现实生活中的陈文昭比较一致。但是《金瓶梅》中的陈文昭，作者虽然也说他是“正直清廉民父母，贤良方正号青天”，他在刚审理武松一案时，也想替武松伸张正义，但西门庆向蔡京等人行贿，陈文昭又被写成是蔡太师的门生，所以最后碍于蔡太师的情面，考虑到杨戩的权威，便不免要妥协让步、徇情枉法了，杨时的情况也是如此，这里就不去细说了。

《金瓶梅》作者对昏庸的皇帝、奸臣权要、贪官污吏的真实描写，以及对真实的历史人物的改造变形，当然都是作者为了表达主题的需要，因而我们从中便不难看出作者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与评价，他的思想倾向性，以及他的审美情趣。

将我们在这本《〈金瓶梅〉人物正传》中所叙述的历史人物的生平行事，与《金瓶梅》中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与评价相对比，读者便不难发现，《金瓶梅》作者对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与把握是十分准确的，作者在书中所作的那些如上所述的改造与变形，正是在准确的评价与把握的基础上进行的。这就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：《金瓶梅》中写到的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，不仅有宋朝（包括金）人，也有明代人。对于那些宋（金）人物能够准确地评价与把握，这不难理解，因为他们已死了几百年，可以说是盖棺论定；但《金瓶梅》作者对于书中写到的那些本朝人物，特别是那些几乎与作者同时代的人物，如上所说，他们有的在《金瓶梅》成书之后

还活在世上的，能够如此准确地评价与把握，作者的用语甚至有些和后来的史家在评价这些明代人物时都很接近，这就很值得注意了。这里的答案只有一个：《金瓶梅》作者熟悉这些人物。

这个答案是有趣的，也是有意义的，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《金瓶梅》的写作年代、成书过程、创作目的，以及作者本人，因为这些问题，特别是关于《金瓶梅》作者，直到现在仍然是未曾破解的千古之谜。

本书的后边收了三个附录，前两个附录是《金瓶梅》一书中明确地写到的宋（金）明人物，这些人物传记写得很简要，一是因为有关资料缺乏，二是受本书的篇幅所限。第三个附录收入的是《金瓶梅》一书中没有明确写出名字的明人传记，但这些人物的事迹却在书中这样那样地出现了，决不仅仅因为了解《金瓶梅》创作与出版过程的知情人，如沈德符等是这样说的，所以才收入的。本书在编排顺序上是将入选人物分成宋（金）、明两部分，每一部分基本上按其在《金瓶梅》中出现的先后排列。

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间仓促，编撰人的水平有限，以及资料的缺乏，本书难免会有不少疏漏的地方，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教正，以便今后修正。

叶桂桐

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于东昌

宋徽宗

北宋元符三年(1100年)正月的一天，寒风呼啸，阴云密布，紫金城中传出了哲宗去世的消息。因为哲宗无子，按照惯例，应该从他弟弟当中选一人继承皇位。当时，后宫中最有权势的是向太后（神宗皇后），在向太后的极力坚持下，十九岁的端王赵佶被宣召入宫，登上了皇帝宝座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宋徽宗。

赵佶，是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，母亲姓陈，元丰五年（1082年）十月生于宫中。六年（1083年）正月，赐名佶。十月，被授以镇宁军节度使，封宁国公。哲宗继位，封遂宁郡王。绍圣三年（1096年），从平江、镇江军节度使封为端王，五年（1098年），加封司空，转为昭德、彰信军节度使。哲宗去世了，按说皇位是轮不到赵佶的，因为他虽是王子，但他母亲的身份并不高，况且他也不年长。然而，当他看到哥哥赵煦（宋哲宗）久病不愈，皇子又幼年夭折，说不定要在兄弟们之间挑选继承人时，他就早早地动开了脑筋。一方面，他想方设法，通过种种途径赢得向太后的欢心；另一方面，尽力给执政大臣们留下良好的印象。到了宋哲宗去世时，他的这些努力确实收到了预期效果，向太后以“先帝曾说，端王有福寿之相，而且仁孝”的理由，把他推上了皇帝的宝座。至此，赵佶由王子到皇帝的梦想变成了现实。

赵佶继位之初，政治上还算清明。向太后虽然答应垂

帘，权同处分军国事，但毕竟年事已高，朝政自然还是赵佶说了算。为了尽快站稳脚跟并迅速树立起威德，赵佶想抓紧干几件顺乎民心的大事，让天下人信服。且说哲宗在位的时候，由于对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所持的态度不同，官僚们逐渐分成了两大阵营：元祐年间，司马光一派掌权，残酷打击变法派；绍圣年间，变法派得势，又指元祐派为奸党，进行报复。因此，就有了元祐党和绍圣党的称呼。元祐党又被称为旧党，绍圣党则被称为新党。宋哲宗在位的十六年间，新、旧两党之间的斗争相当激烈，彼此攻击，相互倾轧，直搞得民生凋敝，怨声载道。这种情况，一直延续到赵佶继位之后。为了表示自己有志于除弊图强，上台不久，宋徽宗就下了一道求直言诏，号召人们公开批评朝政。可是，鉴于以往的教训，上书议论时政得失的人并不多，于是宋徽宗便给先上书的人以很优厚的奖赏，这么一来，上书言事的人果真很快多了起来，人们还都以为宋徽宗确实虚怀若谷呢。接着，宋徽宗又采纳了曾布、范纯仁等大臣的建议，决心消除党争，唯公是论，统一臣僚们的步调，同心同德，达到天下大治。先是下诏追复文彦博、王珪、司马光、吕公著、吕大防、刘摯等三十三人的官职，又把借绍圣之名而怙恶挟仇的蔡京、章惇等人罢黜外任。并将年号定为“建中靖国”，以显示自己将不会因党用人，而要不偏不倚，同心协力，安民靖国。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宋徽宗也确实说话算数，处理政务，往往注意倾听各种意见，待仔细斟酌后，秉公处置，使得各项政务颇有起色，朋党之争也大有好转。可惜，这种状况并未能延续太长的时间，宋徽宗便朝着祸国殃民的邪道上滑行了。

起居郎邓洵武借口继承神宗遗志，奏请徽宗重用绍圣党人，并且使用激将法在徽宗面前搬弄是非说：“如果听任元祐党人任意指责先皇的是非短长，您贵为天子，将怎么自容呢？”这一招果然灵验，徽宗想到，既然曾布、韩忠彦难以依赖，那就起用蔡京好了。纵观徽宗一生，虽然他在治理国家上并无建树，而且算得上是一个享乐误国的昏君，但在文学艺术方面却又不乏天才。还在做王子的时候，他就在书法绘画方面下过相当的功夫，具有很深的造诣，后来甚至用了近三年的时间，临摹宫中所藏的全部传世佳作，书法也能自成一派，被称为“瘦金体”，因而，他的书画技艺相当精湛。闲言少叙。且说宋徽宗由于听信了邓洵武之言，决心起用蔡京，偏是蔡京的字又写得相当漂亮，早就给他留下了良好印象。众所周知，宋朝有所谓“四大书法家”，苏（轼）、黄（庭坚）、米（芾）、蔡，关于这最后一位，究竟是蔡襄？还是蔡京？直到现在，人们还都说法不一呢。这也按下不表。再说此时的蔡京，也正闻风而动，利用自己的党羽，在朝野宫禁中为自己积极鼓吹。宋徽宗渐渐感到，蔡京确可委以重任，于是，立即就把蔡京从外地召回到京师，让他担任了翰林学士承旨的职务。那蔡京惯于见风使舵，言谈话语很讨得徽宗的欢心，揣摩到徽宗有继承神宗变法事业的意图，就故意表现出对神宗朝法规制度的向往。这一来，徽宗索性把年号改为“崇宁”，表示要尊崇熙宁（宋神宗年号）法度，继承神宗遗志，重振变法事业，不再“建中”了。

不久，蔡京授意台谏官弹劾首相韩忠彦，说他私变神宗法度。宋徽宗根本不问究竟，就立即罢免了韩忠彦，将蔡京提拔为宰相。接着，把仍要坚持消释朋党方针、执行中庸政

策的曾布也贬出朝廷。把蔡京提升为首辅。从此，宋徽宗便对蔡京偏听偏信，言听计从，开始实行所谓的“绍述”熙宁法度了。

首先，宋徽宗废除了元祐年间的所有法令，同时将绍圣年间的一切制度尽皆恢复。继而，打着复行新法的旗号，排斥元祐党人，不但把现仍在世的元祐大臣全部罢免，而且命令他们的子孙也不准到京城里来。又禁止宗室与元祐党人通婚。更有甚者，在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的九月，把文彦博、司马光等一百二十人定为奸党，将这些人的名字刻到石碑上，立在端礼门外，号为“元祐党人碑”。然后，又对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上书指责神宗、哲宗以及建议贬斥绍圣党人或为元祐党人鸣冤者进行清算。

在徽宗的庇护和支持下，蔡京以变法理财为幌子，绞尽脑汁地聚敛财富，利用种种名目，将地方上的财力集中到京师，以显示国家的富裕。为了夸耀兵威武力，又对西夏用兵，结果反而被西夏打了个一塌糊涂。蔡京结党营私，任意胡为，使得吏治空前腐败。面对这严峻的现实，徽宗不但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反而陶醉于国富民安、歌舞升平的幻境之中，大兴土木，愈发穷奢极欲起来。

延福五位和艮岳的修建，便是为供其享乐所开始的两项规模宏大的工程。所谓延福五位，就是把当时最大的宫殿延福宫进一步扩建，让童贯、杨戩等五人具体负责，分别建筑一个小区。直搞得亭台楼阁金碧辉煌，珍花异石遍布四周，把它作为自己游玩宴集的场所；政和七年（1117年），宋徽宗又命令户部侍郎孟揆在上清宝篆宫东面的景龙山侧，仿照杭州凤凰山的样子修造假山，前后历时五六年，耗费民脂民

膏不计其数，终于在原来的平地上造成了一座风景秀美、峰峦叠翠的假山，周围十余里，主峰高耸入云。主峰之外，又有什么梅岭、丁香障、飞来峰、瀑布屏等等小山岭，遍种杨柳松竹，广搜奇花异石，就连珍禽异兽也有成千上万。开始时叫凤凰山，后来因为山在京城东北角，按古代八卦方位在艮位，于是又改名为艮岳，当时的人们都称为万岁山。

延福五位和艮岳的修建，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。每天都有数万人在辛苦服役，所需财物则更是从民间拼命聚敛。单是取太湖巨石一项，就需要凿河断桥，毁堰拆闸。他们还专门制造了一条大船，用一千多人牵引着，费时数月才运到京师。朱勔、蔡攸等人，又乘机搜刮，中饱私囊，所过州县，谁敢道半个不字？百姓大遭其殃，天下为之骚然。

在大肆挥霍民脂民膏、尽情奢侈享乐的同时，宋徽宗对于朝政自然也就越来越不感兴趣，朝廷大事全交给蔡京处理，使奸贼蔡京得以专权，朝政日非。而徽宗自己，则把主要精力花在了练字作画、宴饮取乐方面，有时甚至乔装打扮成各种角色和优伶们混在一起嬉闹，实实在在称得上是一个享乐天子、荒唐皇帝。尽管如此，宋徽宗依然心有未足，又异想天开地要乔装打扮一番，走出皇宫到市井间去游逛玩耍。蔡攸、杨戩之流自然是同声附和、尾随而行。走大街，穿小巷，酒肆、茶馆无所不至，玩高兴了有时甚至不回宫里，干脆找一个上等客店住下，第二天再接着玩。不久，新任宰相王黼也加入了伴游的行列，并且专引宋徽宗去逛有名的酒楼妓院。当时，京城里有一个花魁叫李师师，那可是个在行院中声名远播的人物，长得姿色妍美，风流超人。本是好色之徒的徽宗皇帝，对皇宫里的众多嫔妃早已兴趣不大了，正想

换换胃口，一见李师师，不觉先酥了半边。自此便常常临幸师师府，尽情玩耍。时间一长，士庶百姓都知道了此事，见皇帝老官竟如此放荡不羁，仿效的人也便日益多起来，吃喝玩乐，渐成风气。如此一来，北宋王朝的大厦还能支撑得久吗？

宋徽宗不仅追求享乐，放荡不羁，而且崇尚道教，整天舞神弄鬼。他先在皇宫中建起一座金碧辉煌的玉清和阳宫，供奉道家诸仙，然后又下令全国州县都要修建道宫道观。一时之间，方士道姑，遍布海内，道教成为大宋国教。不久，又将方士林灵素召进宫中，把他封为通真达灵先生，让他主管道教。林灵素的信口胡言，却把个宋徽宗哄得团团转，一段时间内，徽宗把林灵素简直奉若神明。常言道，物以类聚，那蔡京、王黼、童贯等人见林灵素很得皇帝信赖，而林灵素又往往在皇帝面前替他们美言一番，所以，他们很快地就结成了同伙，掀起了一股崇奉道教的狂澜。宋徽宗又亲自注释了《道德经》，颁布天下官私学校，并把它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。他自称昊天上帝元子，号曰教主道君皇帝。由于宋徽宗对于道士的宠信，使得道徒数量骤增，仅汴京城内林灵素的徒弟，就有两万多人。每个道观，动不动便拨给官田数百乃至上千顷。全国之内，光是拿俸禄的道官就不下六七万人，造成了一支宠大的寄生虫队伍。这些人往往横行不法，特别是林灵素的徒弟，不仅胡言乱语，欺惑大众，而且仗势欺人，诬陷、坑骗，简直是无恶不作。蔡京、王黼等奸臣与林灵素之流的相互勾结，使得北宋王朝的吏治更加黑暗和腐朽。《金瓶梅》在第七十回，就曾借蔡府管家翟谦之口，对西门庆说起过林真人涉足于官员的任免安插，以其势力影响有

关朝政的事。而这种状况的形成和泛滥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宋徽宗应负有主要责任。

由于长期的新旧党争而政治紊乱，又由于统治者的骄奢淫逸、纵情享乐，使得民不聊生。下层百姓实在难以忍受，于是就先后爆发了方腊、宋江等人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。

内忧不已，外患又起。正当宋徽宗不理政事，只知沉溺于奢侈享乐生活的时候，生活在我国北方的女真族崛起了。北宋时，一直处在辽的统治之下的女真人，遭受着辽朝的残酷奴役，而辽的统治者又相当荒淫，于是，女真族的领袖完颜阿骨打率兵反辽，并且很快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，建立了金朝。北宋与辽本来是友好的国家，阿骨打攻打辽国时还恐怕北宋会出兵援辽呢。谁知此时的宋徽宗却又在异想天开了：想要联金灭辽，收归后晋时割让给辽的燕云地盘，以使自己青史留名。当他把这种想法说出来与大臣们商议时，有人并不赞同，生怕唇亡齿寒。但童贯、王黼却很热心，并不知天高地厚地要领军作战，梦想一举成功，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。宋徽宗见状，自然万分高兴，于是就派童贯与金朝联系。宣和二年（1120年），宋金正式签订了盟约，商定宋出兵取长城以南，金出兵取长城以北，共同夹击辽朝。

如上所说，由于宋徽宗一味沉醉于声色享乐，大兴土木，挥霍无度，北宋王朝早已是外表繁盛，内里空虚了；又由于他重用奸臣，横征暴敛，朝政日益腐败，百姓也更加贫困不堪。而要出兵攻辽，自然要筹集军费，国库远远不够支付，那就只好再行搜刮，直逼得人们卖儿鬻女。好歹出兵的款项总算凑够了，然而，一旦真枪真刀地打起来，不但未能

占得上风，反被辽兵打了个稀里哗啦。最后，还是金兵占领了关南地区。而这样一来，金朝就不肯把燕云地区交给宋朝了。当初大肆搜刮民财时，本是说要收归燕云之地的，现在却落了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，这下宋徽宗可真是打掉牙往肚里咽，有苦难讲了。但为了挽回面子，他又不惜血本，再用金银财宝从金人手里赎回燕云，并几次派人到金朝苦苦哀求。金统治趁机加码，最后提出要宋朝拿出几百万缗（一千文为一缗）的犒军费，除每年交纳岁币四十万外，再把燕京地区的税金给金朝一百万缗，才答应把燕京及六州的地盘给宋。宋徽宗已是鬼迷心窍，竟然满口答应。宣和五年（1123年）四月，当徽宗派人进入燕京等地接管时，看到的只是几座空城，百姓、财物早被金人掳掠、抢劫一空。宋徽宗几乎倾尽了天下的财力，欲图扩边夸功，其结果却是事与愿违，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。更为严重的是，通过一系列的军事、外交行动，金贵族已经看清了北宋王朝腐败无能的真相，所以，在灭掉辽国仅仅八个月之后，便对宋朝大举用兵。宋徽宗引火烧身，自己敲响了北宋王朝的丧钟。

宣和七年（1125年）九月，金国派使者来宋朝，名义上是为告知辽主被擒的事，实际上则是刺探军情；不久，再派人来联系交割云中地盘的事宜，进一步麻痹宋朝廷，使宋朝不加防备。偏偏赵佶对金国派使臣前来的实际意图并无半点怀疑。金统治者眼见时机成熟，便于十月挥师南下，开始了大规模的南侵，而此时的宋徽宗竟全被蒙在了鼓里。金兵先是迅速占领了燕京等地，随即兵分两路，一路经太原南犯，一路从燕京直扑汴梁。十二月，金兵侵入中山府（治所在今河北定县），离东京大约不到十天的路程。徽宗吓慌了，急忙

下诏，承认自己宠幸奸佞、大肆挥霍的过错，叫内外直言极谏，召令外地的军队前来保卫京城，罢道观，罢大晟府，将皇位传给太子赵桓（即宋钦宗），自己退居龙德宫，做了太上皇帝。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正月，金军渡过黄河，京师震动。宋徽宗听知后，简直吓破了胆，急忙借口要到亳州（今安徽亳县）烧香，张皇失措地经扬州，过长江，逃到了镇江。尽管作为北宋最高统治者的宋徽宗畏敌如虎，慌忙逃窜了，但广大的爱国军民是决不甘心做亡国奴的，他们在抗战派将领李纲等人的组织领导下，进行着艰苦、顽强的抗金斗争。二月份，金人在得到北宋割地诏书之后，大军北还。直到四月，宋徽宗才回到了京城。

十一月，金军再次进犯汴京。新继位的钦宗皇帝，迫不得已于靖康二年（1127年）的正月上旬，前往金营议和，结果被扣留。不久，金兵攻陷汴京，徽宗做了俘虏。二月六日，金主在得到降表后，把徽、钦二帝废为庶人。北宋至此灭亡。

四月，在金将斡离不的押解下，徽宗被迫离开了中原故土，经滑州（今河南滑县）渡河北上。府库中的所有积蓄自然已被金人搜刮一空，整个的汴京城也被毁坏得不成样子了。一路之上，举目所见的山山水水无不令徽宗触目惊心，想到以前自己疏远忠良，宠爱奸谀，怠弃国政，耗竭民力，贪图享乐，骄奢淫逸；又不自量力，耀武夸兵，终于引火烧身，致使国家败亡的历历往事，赵佶禁不住掩面而泣，懊悔不已。但自古以来，人君玩物而丧志，纵欲而败度，很少有国破家亡的，后悔又有什么用呢？

经过数月的颠簸，宋徽宗被押到金朝的上京会宁府（今